

中国蒙古族历史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金少萍

(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云南 昆明 650091)

中图分类号: C95

文献标识码: A

蒙古族起源于北方,具有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文化。蒙古族和元朝对中国的历史做出了伟大的贡献。为了弘扬蒙古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交流近年来蒙古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并探讨在新的历史时期蒙古族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等问题,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问题研究中心、中国蒙古史学会、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及蒙古学研究院、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云南省通海县政府、云南民族理论学会、云南蒙古族研究会联合举办 2003 年中国蒙古族历史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具体由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云南蒙古族研究会、云南通海县政府承办。

2003 年 10 月 2 日——5 日“中国蒙古族历史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昆明莲云宾馆隆重开幕。开幕式由内蒙古大学副校长呼格吉勒图教授主持,国家民委原副主任文精致开幕词,云南大学党委书记高发元教授代表云南大学致欢迎词。青海省人大常委副主任高永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原主席浩·巴岱、辽宁省民委副主任包玉梅、日本蒙古学会会长若松宽教授、云南省民委副主任木桢教授、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主任齐木德道尔吉教授、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主任方铁教授、云南民族学会会长郭大烈教授、云南蒙古族研究会原会长杨玮等有关领导出席了开幕式。中国蒙古语文学会、云南民族学会满族研究会分别向大会发来了贺信。

参加本次大会的代表,共有 180 余人。国内代表分别来自内蒙、新疆、青海、北京、吉林、辽宁、安徽、四川、广西、黑龙江、山东、云南、香港、台湾等省、市、自治区。国外代表来自美国、日本、韩国、芬兰等国。

会议期间有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内蒙古电台、内蒙古电视台、云南电视台、云南日报、云南画报社、昆明电视台、昆明日报、今日民族杂志社、云南交通报、玉溪电视台、玉溪日报社等新闻媒介的记者参会并报导了会议盛况。

与会代表向大会提交了 50 余份论文和论文内容提要。会议期间开展了广泛的学术交流,代表们各抒己见,对相关的热点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根据会议代表提交的论文和讨论的内容,拟分为几个专题,试介绍其主要学术观点如下:

一、蒙古族的历史及族源研究

杜玉亭《忽必烈平大理国三大史义说》,论文从以下三方面论述忽必烈平大理国和建立云南行省的历史意义。其一边疆云南最终统一于中国。云南早在汉朝时已设立郡县,即归入中国的版图。但从两汉到唐宋的千余年间,云南的郡县制有不断弱化的趋势,由有名无实趋于名实俱亡。三国时的诸葛亮南征向以攻心取胜著称,但实为与地方势力的妥协,蜀汉时难以在云南驻军进行直接统治。隋唐帝国曾文武并举,再次对云南进行直接统治,但盛唐时却出现一个南诏国,天宝年间两次征南诏归于失败。宋朝时云南的大理国在《宋史》中被列入了“外国传”,不再被视为宋朝疆土。1253 年元世祖忽必烈率军平大理继而设立云南行省,一改云南郡县制逐渐衰亡的趋势,

开创了全新的由分裂到统一的大趋势，使得边疆云南最终统一于中国。其二创设了与多民族云南社会总体和谐的政治建制。蒙古宗王与行省大吏皆为朝廷派 驻省级地方的代表，体现了地方军政大权集中于中央封疆大吏的战略需要，确保了大理国之后的云南行省与中国国家的统一。忽必烈把多民族云南地方官的建制形成较为完备的制度，土官制度保持了与多民族多差异云南社会的总体和谐，这正是云南最终统一于中国的关键环节。土官制度并为明清两朝所继承，这无疑是忽必烈在多民族中国政治建制史上的一大贡献。其三民族精神与人类智慧和合的宝贵文化遗产。这指的是忽必烈所代表的宽容博大的蒙古民族精神与人类智慧和合，是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

包玉清《试论忽必烈平定大理及其意义》指出，忽必烈平定大理，建立云南行省的重要意义在于：其一把云南置于中央政权的直接控制下，从此云南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更加密切，成为永固的边疆。这对于我国西南地区的安定，维护祖国统一，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其二使云南地区政局相对稳定，经济发展，文化兴盛，对西南边疆地区的开发建设具有创举性的意义。其三对我国民族关系的发展也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杨玮《云南蒙古族历史脉络》，论文分三个时期（第一时期从元宪宗三年——明洪武十三年，即 1253 年——1381 年；第二时期为明洪武十三年，即 1381 年；第三个时期为近现代）概述了蒙古族入滇及其在云南繁衍生息的历史，并对有关蒙古族姓氏的发展演变做了详细的考证。

王雄《明朝的蒙古族世家》认为：在明朝时期也有相当数量的蒙古族家族拥受有世爵、世职，已列于明朝统治阶级的行列，可称之为明朝的蒙古族世家。据资料考证有明一代蒙古族首受封爵者有十八家，二十爵。其中传袭长久的蒙古家族，多是永乐后封爵的。这些人一部分是洪武时归附，后追随燕王在靖难夺取帝位中立功者，一部分是永乐时归附的蒙古显族和在永乐北征或在其后镇压南方少数民族起事中立功的蒙古将领。这些蒙古世家，初时多是在明朝的招抚政策下归附的，明朝对其随宜安置，授以官职，赐汉姓、汉名，进行羁縻拢络；继而在进行重大的军事行动时征调他们从征，为朝廷效力、立功；进而封爵授职；使他们在朝廷取得了相当的地位，子孙世袭，历久不衰。后来明朝的蒙古族世家经过 200 多年与汉族交往、同化、融合，在思想、生活、风俗习惯等方面趋于汉化。

高立士《曲靖市余氏族源考》指出，余姓为滇东北大姓之一，分布面广，聚族而居，有不少村庄也多以余姓命名。曲靖市的余姓约有 1400 户，7000 余人。在余姓中及邻里乡村流传着余姓原属蒙古族，谎称汉族的故事。经过从民间“铁改为余”的传说、祖传家谱、墓碑墓志、蒙古族遗俗、遗传特征等方面的考证，认为余姓为元人余阙后裔之说较为有据，而与元朝皇帝无涉，余阙系出自西夏之党项羌人，其后裔有部分已成为蒙古族也是客观事实。认为现在还不能作定论，有待进一步考证。中国是一个统一多民族的国家，历史上民族间的相互融合、同化的现象较为普遍，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通过对余氏族源的研究，加深了对我国民族关系史的这一认识。荣盛《云南宣威余姓蒙古族族籍浅论》，论文根据实地调查的资料（当地人的民族意识、民族心理；寺庙中供奉白马的习俗；蒙古族文物马鞍、弓箭），古墓碑遗址，族谱资料等对云南宣威市的铁改余姓的族籍问题进行了考察，认为宣威余姓当属蒙古族后裔。铁木余昭《永远的草原蒙人心》文章通过对分布在云、贵、川、湘、渝等省市铁改余氏蒙古族 700 余年来生存发展史的调查和分析，论述了在民族的诸特征中民族心理、民族意识的重要性，是维系民族存在的极为重要的纽带。并指出铁改余蒙古人近 700 年的生存发展史和他们的民族心理和民族意识，直接为中国民族理论的研究提供了宝贵而丰富的素材。

明安特沙·东希格《蒙古族姓氏史记》（蒙文），笔者耗费了 20 余年的时间和精力，走遍内蒙古自治区各盟市苏木嘎查，深入进行社会调查，查阅了数百本古今中外的历史文献、档案资料 and 文史书籍，翻阅了多种报刊杂志及专家学者的有关研究论文，从中吸取精华，搜集了 4525 种蒙古族姓氏，在此基础上编写了《蒙古族姓氏史记》。写法上采取了蒙文字母排序形式，选写了姓氏名称来历、社会变迁、分布情况、风俗习惯、传说典故等。张杰《清代蒙古旗人硃卷的史料价值》

指出：硃卷，原指清代在乡试和会试中，为防止考生舞弊，将举子用墨笔写的试卷密封后，交誊录生用硃笔重新誊写的卷子。清代士人中举人、进士后，有自行刊刻硃卷的风气，而且“硃卷必具履历”（语见潘光旦《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成为研究历史社会学的重要资料。顾廷龙主编的《清代硃卷集成》一书，收录了部分蒙古士人的硃卷，为今人研究蒙古族的历史文化提供了新的史料。例如，关于蒙古大学士倭仁，近年李细珠著《倭仁研究》中说：“他的主辈、父辈连名都未留下”（该书第7页）。而倭人之孙衡瑞在其硃卷中写道：“高高祖诺海，高祖达三，曾祖文成，祖倭仁，号艮峰，行二。”硃卷的史料价值由此可见，倭人的祖父和父亲的名字也得以流传后世。

二、元朝时期的政治、经济研究

方慧《略论元代对云南治理政策的特点及影响》认为：元代统治者十分重视对云南边疆地区的治理，较之元代之前历代中原王朝统治者对云南的治理，元代的治理政策有其特点：其一治理云南的指导思想发生了根本改变。元代以前，历代中原王朝统治者对云南均是实行“羁縻政策”，而元代在云南的统治方式由羁縻制改为土官土司制，并从中原委派官员到云南进行统治，始建行中书省。其二全方位的治边政策，包括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其三针对实际的统治方法。除朝廷官吏到云南行省进行统治外，还派宗王坐镇云南，使二者相互牵制，以保证元朝中央对云南的绝对统治。同时任命各民族的酋长为元朝的土官，利用之对当地各民族进行有效统治，减少阻力。并在适当的时机削减土官的势力。元朝对云南的治理政策，使云南各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影响深远，加强了云南在政治上与内地的统一；促进了云南地方经济的发展；成功的民族政策，增强了各民族间的凝聚力。

朱耀廷《征服与被征服——从忽必烈“治天下”的制度措施看军事征服与经济文化征服的关系》指出：蒙古贵族得天下主要靠的是军事征服、民族战争，对于被征服的民族和人们来说，他们是征服者。但在他们得天下后要完成“治天下”的任务，却不能只靠屠杀与镇压，还要着重解决经济问题和思想文化统治的问题。他们必须适应先进地区的经济与文化，采取适合当地情况的政治经济制度。因此，对于这种先进的经济、文化来说，他们又成为被征服者。蒙古贵族“治天下”的事实证实了恩格斯“征服者被征服”的论断。但蒙古族的这种“适应”与“被同化”又具有自己的特殊性，一方面进入各个先进民族地区的蒙古上层统治者和人民中的一部分，逐步接受了先进的经济和文化，逐步被先进民族所同化。另一方面蒙古族大部分并没有内迁或西迁，仍保持蒙古族的传统和习惯，只是吸收了先进地区的某些影响，并没有被汉族或其他民族所同化。研究蒙古族“治天下”的制度措施，探讨军事征服与经济文化征服的辩证关系，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历史发展的规律。

古永继《元代云南建省的历史意义》指出：元初统一全国，划分政区为省制，设腹里一中书省及十行中书省；云南为十行中书省之一，结束了长期以来因地处边疆、分合兴废而局势动荡、地位多变的状况。秦时略通五尺道，势力进入滇东北；汉代在今云南部分地区设置郡县，而西南经营的重点在于巴蜀，发展尚较落后的云南，自然只能默守附庸的地位；魏晋南北朝时中原动荡，云南相对安定，但由此尾大不掉，内外条件孕育起一批地方大姓和割据势力；唐代的南诏不时与中央抗衡，被后人归咎为导致唐亡的原因之一；宋代视大理为烫手山芋，摒为化外，避之惟恐不及。在此千余年间，云南一直处于中央王朝统治的边缘，视中原局势的变化而与之保持或即或离的关系。元统治者以外族入主中原，内地、边疆视为一体，云南首次单独作为一大行政区而与内地各省平列，沿至明清乃至近代相沿不改。元代建立云南行省有着深刻的原因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此后云南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发展迅速，与内地凝为一体。本文拟从建省原因和建省后的结果，论述元代云南建立行省在其社会发展史上所具有的划时代意义。

陈世松《元王朝与西部大开发》认为：西部大开发是中国政府面向21世纪的一项重要战略决策，与历史时期中央王朝对西部地区的治理经营，无论从性质、规模、影响论，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似乎与历史上的元王朝扯不上关系。但是，仔细考察，作为一个远离政治中心，与东部地区

拉开经济发展差距的西部格局，却是自元朝开始形成的。元王朝治理西部的一系列政策，为明清王朝所借鉴，其所针对解决的民族问题、宗教问题、经济发展落后的问题，仍然是困扰今天政府，尚待解决而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梳理历史上元王朝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对比明清王朝如何从元朝的治理中吸取经验教训，就能够为今天的西部大开发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

金海《近代喇嘛教与蒙古政治》指出：近代以来，蒙古喇嘛教出现了衰落趋势，但它作为蒙古民族全民信仰的宗教，在蒙古人精神生活中仍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同时与蒙古地区的政治发生越来越密切的关系。其表现形式大致有两种：一是近代以来蒙古地区发生的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中均有喇嘛教上层参与并在其中扮演主要角色；另一个是有些喇嘛教上层直接掌管蒙古地区的政治权力。这种“宗教世俗化”现象的出现有两个方面原因：从喇嘛教上层来说，他们希望依靠世俗政治权力或以宗教干涉政治的手段来摆脱日益衰落的命运；从世俗统治者来说，他们一方面强调“政教分离”、“宗教不得干涉政治”等原则的同时，又往往要求喇嘛教上层时时为其政治目的和活动提供帮助。这两个方面促成了近代喇嘛教与蒙古政治发生了更加密切而复杂的关系。

方铁《元代云南行省的农业与农业赋税》认为：蒙元享国虽仅百年，却是云南发展史上重要的转折点。由于蒙元贵族是来自边疆的少数民族，“华夷有别”与“内华夏、外夷狄”的偏见比较淡薄，对边疆少数民族亦较少歧视。为获取赋税与矿产品，以及通过边疆对外进行扩展，蒙元统治者在云南实行积极经营政策。1274年元朝在云南建立行省，统治地域超过今云南省。云南行省在各地广开屯田，同时设立一些屯田管理机构。元代云南见于记载的屯田约有483335亩，数目相当可观。元代云南屯田，是云南历史上官府主持的首次大规模屯田，产生了很大的经济效益与社会影响。云南行省辖下的民田也有很大发展。行省还在屯田之处和其他农业地区积极开发农田水利。以较快发展的农业为基础，元朝首次在云南普遍收取农业税，其实质是封建剥削，但客观上也促进了云南农业的发展。元代云南农业进步最快的地区是东部山区和西部、南部边疆。元朝在这些地方的积极经营，为明清移民的大量迁入创造了有利条件。

赵华富《元代契尾翻印件的发现》指出：20世纪40年代以来，元代土地典卖、土地所有权转让的契约文书已有零星的、个别的发现。元代有没有政府颁发的土地买卖、地权转让的契约证书——契尾呢？《婺源茶院朱氏家谱》之中刊载的契尾，还是首次发现。这个发现不仅填补了元代社会经济史，特别是元代土地制度史和元代经济法史的一个空白，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填补了中国社会经济史，特别是中国土地制度史和中国经济法史的一个空白。包庆德《明代内蒙古地区灾荒公布规律与特征》指出：明代内蒙古地区各类灾荒频繁，对该地区的生态破坏及社会危害巨大。作者依据《明实录》、《明史·五行志》、《内蒙古历代自然灾害史料》以及部分相关地方志和档案史料，就明代内蒙古地区各类灾荒时空分布规律、灾荒发生特征以及灾荒后果影响及其社会危害等问题进行了简要梳理和扼要分析。

三、蒙古族文化习俗研究

白长明《试论蒙医药学在蒙古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指出：蒙医药学是蒙古民族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和生产劳动以及同自然界、疾病作斗争中逐步积累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概括。在其理论体系及医疗技术中，既有古代北方各民族医学成份，又有汉藏医学的有益因素，这些在蒙古文化发展与繁荣中得到不断升华，从而形成独具特色与优势的蒙医药学，她是蒙古民族开放型文化的产物。蒙医药学作为一种实践科学在蒙古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蒙古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她是我国乃至人类传统医药学宝库中的璀璨明珠。蒙医药学在蒙古文化发展过程中起着促进作用，使蒙古族文化得到丰富和发展，二者之间具有互动关系。蒙医药学为蒙古族以及人类的繁荣昌盛做出了贡献，对人类文明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对此，我们应当正确的认识，并很好地继承与弘扬。

佟德富《蒙古族在科技领域的历史贡献》指出：蒙古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古老而伟大的民

族之一，她不仅对于祖国的统一、疆域的开拓、中华民族的形成以及政治、经济、军事、哲学、文学、史学、法律、体育、中外文化交流都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在科技领域也做出了杰出贡献。蒙古族在科技领域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医学、天文历法、数理化和制造等诸多方面。彭清深《吸纳与嬗变：蒙古文化对元曲的影响》认为：蒙古文化源远流长，自公元前3世纪以来，生活在蒙古高原上的匈奴、乌桓、鲜卑、柔然、突厥、回鹘、契丹、女贞等部族对12世纪兴起的蒙古民族，不仅有血缘关系，还有着深厚的文化交融历程。蒙古文化也是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的集合。她的音乐歌舞广泛吸收西北诸多民族的营养，乐曲有大曲十八种，小曲十二种之分。元曲就是在深受蒙古音乐的影响，由曲词嬗变而来。本文通过对元代北曲的特色分析，折射蒙古文化的明快与恢宏。

崔东权《朝鲜世宗皇帝的训民正音和元世祖的八思巴文字》指出：训民正音是由朝鲜第四代帝王世宗1443年创造并颁布的。有关它的起源，从训民正音创造当时，就有“训民正音是模仿篆文造的”和“训民正音是模仿发音器官造的”两种相反的记录。训民正音的子音字和发音器官有何关系？训民正音的解说书中的解例上有详细的记载。但是具体篆文是何种文字，没有详细说明。这就引起了后人的广泛争议。本文试图将两种训民正音相反的主张，利用训民正音和八思巴文字的关系来阐明，并叙述创造训民正音的朝鲜世宗皇帝，如何受到创造八思巴文字的元世祖的语言政策的影响的。关于训民正音的起源，争议颇多，这与当时的政治背景有密切的联系，并且必须从佛教的关系方面解释其原因。船田善之《蒙元时代公文制度初探》，论文着眼于蒙元时代的公文制度，并借助公文里的语言的各种运行情况，探索当时各个民族的交往与融合。着重论述了以下两方面：其一“蒙文直译体（硬译公牍文体）”的形成。目前还未见直接表述此方面的历史背景的史料，然而嘉宾尼的描写给我们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线索——贵由汗送给教皇的书信的翻译过程，就是蒙元政权将公文翻译成外语的基本方式。笔者认为，蒙元直译体就是依据这种方式逐步形成的。其二以刻在石碑上的公文做个案研究。试析“长清灵岩寺执照碑”，该碑包括公文行移和处理议案的过程。该碑所刻公文引用命令保护、免税、免役的圣旨，因此可作为探讨寺庙、道观等建立“白话碑”背景的重要研究资料。

何颖《台湾学者眼中的蒙古文化——台湾学者林修澈、黄季平的“蒙古民间文学”印象》指出：林修澈、黄季平的《蒙古民间文学》，是台湾蒙藏学术丛书的第一部。也是台湾学者首部研究“蒙古民间文学”的概论性著作。它以蒙古族为中心，扩及广义蒙古人各族，研究涉及中国大陆、蒙古国和俄罗斯等跨国的蒙古人广阔的文化区域。该书注重民间文学自身的规律和审美价值的阐述，并在文化的视野下进行多维度的分析。《蒙古民间文学》的比较研究，建立在充分的田野调查、全面的文本资料和较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设置了相对的可比性模型。该书在分析过程中，注意历史观照与综论辨析的结合、宏观评述与微观剖析的交错，从比较研究中找特点，在图表对照中显特征。《蒙古民间文学》对于繁荣台湾地区民间文学研究，弥补台湾蒙古族文化研究的不足，有着重要的意义。那木吉拉《额尔古涅——昆传说的神话原型重构——蒙古、突厥语民族狼图腾神话传说探讨》指出：额尔古涅——昆传说的神话原型，曾不止一次地出现在古突厥语民族狼图腾神话传说里。的确，额尔古涅——昆传说的神话原型与突厥语诸民族狼图腾神话传说相似。然而，此类神话并不一定是突厥语民族所独有，更不是蒙古“拾突厥唾余”。蒙古族和突厥语民族同属阿尔泰语系民族，族源和地缘关系非常密切，文化交流极为频繁。他们在历史上都曾崇信狼或以狼为图腾。所以，两个民族远古时期的民间都曾流传此类神话传说。只是突厥语民族先民的神话传说较早地被采集并载入史册，而蒙古族的则在民间长期流传，直至文字记录时，其原始的神话观念已经淡化，演变为族源传说。再者，无论是额尔古涅——昆传说的原初形态，还是突厥语民族狼图腾神话传说，都是从世界很多民族中流传的末世论神话——大劫难之后人类再生神话类型变异的结果。

若松宽《“格斯尔”与波斯神话》指出：蒙古英雄史诗《格斯尔》中的人物希鲁·塔斯巴是指古代波斯神话中征服龙的英雄凯勒萨斯帕。以独特的视角论述了《格斯尔》与琐罗亚德教的关系。僧格《与蒙古社会制度有关的狩猎词语的考证》指出：狩猎是蒙古人最早的经济形式，为后来的

游牧经济的产生奠定了物质基础，而且对蒙古社会制度文化产生过重要影响。笔者基于古代汉文献的相关记载，利用《史集》、《蒙古秘史》等信史和蒙古文编年史，以及外国旅行家、使者的笔录，通过对蒙古部族名、姓氏以及“失舌罗勒中合”、“只勒都”（“半截腔子”——祭祀用品）、“安答”、“蔑儿干”、“薛禅”、“答刺罕”等词语的考证与诠释，探讨了狩猎在蒙古古代社会制度文化中曾负载的重要功能和作用。纳古单夫《“蒙古博尔济吉忒氏族谱”之版本及其研究》指出：“蒙古博尔济吉忒氏族谱”成书于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作者是中国蒙古喀喇沁部人罗密，原稿用蒙古文写成，后由作者译为汉文和满文二种文字。这部巨著在国际蒙古学界，被誉为继《黄金史》、《蒙古源流》之后，研究明代蒙古史的又一部重要的历史文献。论文还详细介绍了国内几种汉文版本的情况及国内外学者对该族谱的研究状况。

祖生利《“元典章·刑部”直译体文字中的特殊语法现象》，作者考察了《元典章·刑部》直译体文字中诸多特殊的语法现象，从语言接触的角度，利用元代白话碑文、《蒙古秘史》等蒙汉对译材料，对这些特殊语法现象产生的原因作出解释。鲍音《“白翎雀曲”考略》指出：元统治者推行汉化政策，使北方语系相对统一，形成了“天下通语”。在辽金蒙古音乐歌舞中也融进了元杂剧，促进了元杂剧的形成、发展和繁荣。这样文学转型时期的重大成就，以元杂剧体例的形成表现出来，成为一代新声。元杂剧体例形成中《白翎雀曲》当是一个典型。《白翎雀曲》在元杂剧体例形成及其发展史中具有重要地位。长期以来，学术界忽视了对该曲的研究，关涉该曲的“异说”需要订正。本文就此略作考述。达力扎布《康熙朝“蒙古律例”的两种版本》指出：《蒙古律例》是清崇德八年编辑的蒙古法规汇编，在嘉庆年间编撰《理藩院则例》之前，一直是实行于蒙古地区的重要法规。后来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和社会需要多次修改和补充，现存最早版本是康熙年间的蒙古文本，即分别增定于康熙六年和康熙三十五年的两个版本。本文对康熙朝《蒙古律例》的这两种版本做了简要介绍和比较。两种版本的编辑都没有什么章法，条例既不分类，也不按时序编排，反映了其早期简陋的特征，也说明《蒙古律例》是一部蒙古法规汇编。《蒙古律例》正如清朝各部门的《则例》一样，在实践过程中不断根据实际需求进行修改。从康熙六年到三十五年的三十年间，就有了很大改动。官衔、朝贡、喇嘛等方面的条例大增。总的趋势是定例的范围在扩大，条例内容越来越严密，更具可操作性。除了对顺治朝制订的有些过激的条例进行更正外，《律例》有比较明显的中央集权和内地化的趋向。

叶新民《“马可波罗行记”中记述的蒙古习俗》指出：《马可波罗行纪》对元代中国的社会面貌有许多精彩的描绘，其中有些篇章是记述风俗习惯的。其中不少篇章记述了古代蒙古人日常生活的习俗，涉及到居住、饮食、婚姻、丧葬、祭祀、宗教信仰等许多方面。论文对与此有关的部分，均作了细致的考述。马可波罗关于蒙古习俗的记述，其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可以看出，他对元代蒙古人的生活很熟悉。他的记述绝大部分是真实可信的（也有个别地方记错或夸大其词）。它可以和汉文及其他文字史籍的记载相互印证，也可以填补其他文献资料记载之不足。因此，笔者认为，《马可波罗行纪》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杨德华《探寻云南蒙古人最早古墓“达子坟”》，笔者通过对大理地区“达子坟”的实地考察，指出：“达子坟”即蒙古人坟。“达子坟”当是1253年忽必烈大军远征云南大理时战死于大理境内士兵就地埋葬的坟墓。它是云南蒙古族最早的古墓，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最具规模的蒙古族古墓——地面坟冢，是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应加以保护和研究。

宝贵贞《蒙元时期蒙古人宗教信仰多元化问题初探》认为：蒙元时期，蒙古人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宗教信仰作为其精神生活的支柱呈现出多元化特征。萨满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道教等宗教形态都不同程度地对当时蒙古人的精神世界产生了影响。本文在着重挖掘蒙元时期蒙古人宗教史料的基础上，就当时蒙古人宗教信仰的多元化现象及其原因进行了分析。即蒙古人自身的文化传统、蒙元时期的多民族融合状态、帝国统一的政治目标、宗教政策的导向和宗教自身的性质等因素共同促成了蒙元时期蒙古人宗教信仰多元化的形成。

四、蒙古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研究

任月海《多伦汇宗寺在清代边疆史上的意义》指出：1691 年清朝康熙皇帝在多伦诺尔与外蒙古三部和内蒙古四十八旗王公的“多伦诺尔会盟”中敕建的汇宗寺，作为清代内蒙古地区喇嘛教中心，对于国家的统一、边疆的稳定曾经起到过重要作用。汇宗寺是清朝皇帝敕建的第一座喇嘛寺庙，开创了有清以来利用喇嘛教统治蒙古高原的先河，并委派章嘉活佛住持汇宗寺，以“大国师”的身份在内蒙古形成庞大的“呼图克图”系统，通过汇宗寺达到对蒙古各旗的有效统治。同时，由于民众的朝拜，蒙古各地人口流动，促进了蒙汉两地的商品贸易发展和经济文化的交流。齐木德道尔吉《四子部落迁徙考》指出：17 世纪上半叶，阿鲁蒙古的一支——四子部落（DÖRBEN KEÜKED）从大兴安岭北麓呼伦贝尔草原迁徙到阴山北麓西拉穆伦河流域，整个迁徙过程复杂而离奇，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研究。四子部落的游牧过程颇能说明 17 世纪上半叶满蒙关系的实质，有助于了解清代乌兰察布盟形成的历史。本文利用《清实录》、《满文老档》、《旧满洲档》、《内国史院档》以及蒙古文档案资料，试图对四子部落的迁徙过程作一个考察。

卢明辉《后金（清初）与科尔沁诸部联姻政治》指出：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时期，清王朝对北方边疆蒙古等诸民族，实行的“婚盟政治”等羁縻制驭政策，为其今后举兵入关，击败明朝，建立与巩固清王朝对全国统治的局面，都具有积极而深远的巨大影响。同时，他们更清楚，驻牧于北疆的蒙古诸部，是清王朝用以“防备朔方”最好的“屏藩”。因此，努尔哈赤与皇太极都极其重视“满蒙联姻”关系的巩固发展。从清太祖努尔哈赤肇建后金政权，到太宗皇太极改元清朝，以其勇武睿智，实行积极的满蒙联姻政策，为清王朝奠基，建造了伟业丰功。张久和、张文平《库莫奚基本史料辨析》指出：库莫奚是在北魏时期始见于历史记载的北方诸族之一，至五代为契丹所并，成为契丹族的一部分，而库莫奚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由此退出了历史舞台。从《魏书》到《新五代史》的历代大多史书，对库莫奚都有简略各异的记载。这些史书由于史料来源的差异，有的反映的是库莫奚在各个时代的第一手史料，有的则是摘录转抄前出史书的第二手史料。第二手史料相对于第一手史料，或原文照搬，或加工取舍，甚至在转抄过程中出现一些讹误。如何鉴别这些史书中的第一手与第二手史料，并评价它们的史料价值，本文对诸家史书的相关记载一一予以考辨，力求对库莫奚的基本史料，获得一个正确公允的认识。

纳为信《回顾回回人与蒙古人的传统友谊——怀念元咸阳王赛典赤·赡思丁》指出：早在蒙古族兴起之前，便不乏回回商人活动在蒙古草原。成吉思汗西征时数十万回回加入了蒙古大军，并随之东来中国，参加了蒙古人统一中国的伟大事业。云南最早的回族是随元世祖大军平云南时与蒙古族一起来到云南的。咸阳王赛典赤·赡思丁是元代一位享有盛誉的政治家。他于晚年受世祖忽必烈派遣在云南设立行省，秉承世祖赋予全权，为云南各族人民做了许多好事：废除领主所有制，把土地分给人民；开设云南诸路行中书省为我国行省之始；选择了美丽的省会，大兴水利；首建文庙，开创云南学校教育的历史；团结各民族，在尊重各民族宗教信仰的同时，建清真寺奠定云南伊斯兰教的基础。赛典赤行省云南 6 年，认真执行了蒙元王朝奉行民族平等，加强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发展经济、文化等一系列方针政策。他的惠政流传至今，后人在昆明建“忠爱坊”纪念他。

五、新时期蒙古族的研究

郝维民《刍议西部大开发与蒙古族》指出：中国的西部大开发是 21 世纪伊始举世关注的大事，它与蒙古民族的发展密切相关。在 20 世纪结束的时候，中国的蒙古族人口达到 581.3947 万人，主要分布在西部大开发的省区。正确、充分认识蒙古民族在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作用和卓越的贡献，是议论西部大开发与蒙古民族发展的着眼点。在西部大开发中，要充分借鉴在新中国 50 年历史上蒙古民族发展的经验乃至教训；把握民族特点、地区特点，制定从实际出发的方针政策；研究、弘扬蒙古民族的历史与文化；注意保护、治理蒙古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要以法制保障蒙古民族的持续发展。申晓亭《建设蒙文文库的思路与建议》，该文结合《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和参加美

国哥伦比亚大学合作项目的工作实践，提出：仅有文字处理系统，还不符合建立蒙文文库的要求，建立蒙文文库需要有统一的编码和兼容多文种的蒙文文字平台；在现有条件下，国外许多借助拉丁转写建库，国内多借助汉文建库；以拉丁转写替代蒙文建立蒙文文献数据库是一个科学的、可行的方法。建议：积极开发 Windows 蒙文平台，开发蒙文 OCR 识别软件；统一拉丁转写方案；通过机读目录系统、扫描技术以及对编辑文档数据进行改造等不同途径建设多种类型的蒙文文库；国内的相关项目要实现数字化、网络化；进一步开展国际合作，建立国际性的、网络化的蒙文文库等。

杨·巴雅尔《从滇、川蒙古族文化现状谈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认为：基于滇、川蒙古族文化的现状，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问题进行阐释，既是对文化的理论探索，又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论文试从文化的相互影响与互渗、文化的异己与创新、文化的认同与复兴、文化的相融性与多元性等方面对传统文化的一些特征的再认识进行了论述；同时就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问题的思考，提出自己的观点。旨在更好地保护和弘扬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促进我国多元一体的民族文化进一步繁荣与发展。杨剑利《云南蒙古族历史文化在建设民族文化大省中的作用》认为：云南蒙古族历史文化服务于建设民族文化大省的需要，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呼之而出。其规律性是曾经在祖国统一、多民族融和的中华文化中代表过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其知识性启迪后人“变则通”的创新意识，为切实解决开发中的深层次问题打造思想平台；其借鉴性是发掘历史沉淀之精华服务于现实，“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其凝聚性体现了云南蒙古族 750 年以来开疆拓土、繁衍生息、历经艰辛而灿烂辉煌历程的内聚力。以上“四性”分析，反映了云南蒙古族历史文化是建设民族文化大省的基础和源泉之一。当今的研讨、发掘和开发应用是云南蒙古族历史文化的延续和发展。敖俊德《新中国蒙古族 ABC》指出：新中国的蒙古族具有人口众多、素质较高及居住地域辽阔、分散中有聚居的人口特征及分布特点。而其政治、经济、文化的特点则可概括为这样几个方面：区域自治先行，影响深远；经济持续发展，潜力巨大；文化保持特色，独具魅力。

六、其他地域的民族文化研究

韩官却加《青海蒙古族研究综述》指出：公元 13 世纪中叶蒙古族进入青海后，虽然在史书中多有记载，但是很不完整，对青海蒙古族的系统研究更是起步较晚，解放前只有寥寥 20 余篇文章。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青海蒙古族的研究，在研究的内容和范围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获得了一大批新的研究成果。阿布都克里木·热合满《20 世纪新疆维吾尔民俗文化的发展》认为：20 世纪是新疆维吾尔民俗文化全面发展和演变的一个历史阶段。在这一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维吾尔传统的民俗文化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并且吸收和自我更新，为顺应时代的发展而进行大胆改革之后，得到了发展和演变。这种变化与维吾尔人的文化、教育，意识形态，文学艺术等方面的发展是同步的；另一方面，维吾尔民俗文化的发展也走过了一段曲折的道路并逐渐得到完善。在这个过程中，它的发展受到了外来文化的辐射和内部积累的推动。从这个意义上讲，维吾尔传统民俗文化的内在结构、内容、形式及总体发展方向的演变胜过以往的任何一個时代。

除上述相关论题外，还有部分从新的视角探讨中国疆域史和蒙古族历史文化的论文。李大龙《先秦夷夏观与中国疆域的形成——中国疆域形成理论探讨之一》指出：中国疆域史是中国边疆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其研究的对象是中国疆域形成、发展演变的具体过程和规律。其中，对于中国疆域形成原因的探讨，自然是中国疆域史研究者首先必须面对的问题。长期以来，学者们对中国疆域形成的研究倾注了大量的精力，众多有关或专门性论著的发表即是明证。但综合分析这些论著，学者们所关注的多是系统地阐述中国疆域形成的具体过程，而少有人对中国疆域形成的原因进行系统的探讨。笔者认为，对中国疆域形成问题的探讨，应该包括两个主要方面的研究：其一是对中国疆域形成具体过程的系统阐述；其二是对中国疆域形成进行深层的理论探讨，探索其

形成的原因和规律。也只有这样，对中国疆域形成问题的研究才是完整的。有鉴于此，试图从中国古代夷夏观的变化方面，对中国疆域形成的原因做一些粗浅的理论探索。有关社会性别视角的：宝贵敏《蒙古族妇女口述史初探》，论文作者在对数十位蒙古族妇女访谈个案的基础上，探讨了蒙古族妇女口述史研究的有关问题。其一做蒙古族妇女口述史的缘起及意义；其二访谈对象的选择（包括城市的、农区的、牧区的蒙古族妇女）及她们各自的特点；其三访谈题目的确定和访谈内容的把握，包括蒙古族妇女的民族身份认同，他们的婚姻生活、家庭记忆、个人生活经历等；其四做蒙古族妇女口述史的目的。蒙古族妇女口述史力求以口述的方式，记录蒙古族妇女的生活和生存状态，保留蒙古族妇女自己的真实声音，从女性的视角，解读蒙古族妇女的文化特征和历史变迁。

马世雯《云南兴蒙蒙古族妇女角色和社区地位的演变》指出：云南通海兴蒙蒙古族 700 余年前随忽必烈蒙古大军征战来到云南。数百年以来，蒙古族妇女与男性一道承受了历史、政治、时代、地理环境及生产生活方式的变迁和落籍云南后的荣辱与兴衰。在历史的大转折中，她们和男性一样以顽强的毅力在不同于故乡的文化背景中，重塑民族的精神与希望，用双手撑起了半边天。她们是家庭的重要支柱，但在过去，其家庭及社会地位低下。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妇女的地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近 20 年以来，兴蒙妇女中出现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女干部、女教师、女科技工作者等。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在社区活动中，她们逐步成为活动的主要参与者、主持者。这与她们在坎坷的人生道路上和在困境中炼就的坚韧顽强的性格、自尊自强自立的精神分不开，这也是时代的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必然，最终使她们从家庭生活的磨练中脱颖而出。现在无论在家庭、社区及民族文化的传承等方面，她们都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还有从人类学视角的个案研究，如马京《从边疆研究的途径看云南蒙古族——以通海县兴蒙蒙古族乡为个案研究》指出：林耀华先生的《边疆研究的途径》一文阐述了从整体上研究和把握民族生存的自然环境和社会人文环境、个体与群体的互动关系以及文化变迁对民族发展的调适作用。“人类社会无论在什么区域，或在什么时代，都包括三个要素的交互作用。这三个要素是什么？它们是环境、人类和文化。”云南的蒙古族主要是元朝从北方草原迁移而来的蒙古族后裔，与世居于西南边疆的其他少数民族在历史渊源上有很大不同。他们具有蒙古族的传统文化特点，但又不完全同于漠北的蒙古族，他们的文化生活虽然仍保留有茫茫草原畜牧生活的印迹和民族认同，但却更明显的烙上了高原农耕文化的色彩。作者通过田野考察，从环境、人类、文化三个要素探讨了落籍云南兴蒙乡的蒙古族从游牧到渔业再到农耕的社会历史文化变迁过程。

王世丽《儒学思想与云南蒙古族聚居区的形成》一文也颇有新意，认为：云南蒙古族作为蒙古族的一个部分，主要聚居在通海县兴蒙乡，他们有自己的语言（卡卓语）而使用汉文，入滇 750 年来始终以蒙古人自居，保持着本民族的自我认同感。在留居云南的蒙古人、女真人、契丹人大多汉化或夷化的情况下，为何唯独在通海县的凤山脚下保留了完整的蒙古人聚居区呢？这与元明清时期成为云南主流文化思想的儒学的倡导与传播不无密切关系。首先，自行省到都元帅府、州、县都以倡导儒学为务，从赛典赤·赡思丁到阿喇帖木儿右旂，都是忽必烈皇帝行汉法的忠实执行者。他们的行为使蒙、汉、夷统治者的社会基础更为巩固，有了共同的思想基础，也为云南蒙古族的继续存在提供了理论依据。其次，儒学倡导的民族思想也促进了蒙古族驻军与当地百姓、爨白军的融合。由于双方在利益上的一致性，形成了蒙古族民众与爨白民族的互通婚媾、互相学习生产技术的局面。使通海兴蒙蒙古族有了生产和生活的基础。第三，蒙古族传统文化与儒学精神的结合是通海蒙古族聚居区存在文化基础。蒙古族同胞在思想文化上兼容并包，尊孔崇儒、敬仰祖先、奉信佛法，从而与周围的夷、汉民众和睦相处，绵沿至今。

2003 年中国蒙古族历史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胜利召开，是中国民族史学界的一件大事，不同学科背景、不同国界、不同地域、不同年龄层次的学者之间的探讨和交流，促进了多学科、多视角的交融，既展示了当代蒙古族历史与文化研究的最新成果，也推动了学术研究方法的重构与递进。

Survey of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nference on History and Culture of Chinese Menggu People

JIN Shao-ping

(Center for Studies of Chinese Southwest's Borderland Ethnic Minorities, Yunnan, Kunming,
650091)

收稿日期: 2004-03-29

作者简介: 金少萍 (1957-), 女, 云南大理, 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主要从事文化人类学研究。

(责任编辑 绍平)